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创意之源

最近的巴塞罗那之行，几乎变成了“高迪”之旅——走进建筑大师的童话连续剧，“轻软而放松”。

在高迪旧居，我发现其重要的创意之源：古老橡树。

森林是他的灵魂属地。树木透露的远景，是世界文化遗产——圣家族教堂的视觉形象。

百年来这教堂一直生长着“枝叶”，随处可见植物元素：各种造型，在树纹中浮现。彩窗，如树叶间隙漏下的阳光。

我们穿越的，不仅仅是“森林”，更是一条时间通道。

安葬在教堂下的高迪已融入“树根”，慢慢长成“一棵离上帝最近的树”。

《行者》，行走在浓阴深处。每片不一样的叶子，呼应着创意的精灵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:xdc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

圣家族教堂
摄/傅筠

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

文/朱大可

“这是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，没有起始，也无终结，你可以从其中任何一页打开，甚至直接用手指插入衬页或尾部，但它仍然没有起始和终结。”这是博尔赫斯在其《沙之书》里所描述的“圣书”。它仿佛是对《山海经》的一种跨时空暗喻。这部来自中国的“无限之书”，不只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碎片化叙事，更展示出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——好奇、天真，对所有异象和奇迹深信不疑，而这正是21世纪中国人最短缺的事物。在世故和心机的酱缸里翻滚了2000多年，《山海经》早已失去当年的纯真读者。

2000多年前的战国晚期，它的作者——一群年迈的祭司，面对青铜灯盏，借助昏暗的光线，翻译、抄写和拼缀那些来自巴比伦、天竺、安息、大秦和本土的书卷。面对莎草纸、羊皮卷、竹简和丝帛，他们采集破碎的意象，按东南西北及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组，如同炼金师从烧杯中汲取金黄色的汁液，再灌入清亮的水晶小瓶。他们被文本里的各种“幻象”所包围，脸上露出无限复杂的表情。他们看到了这部典籍的曲折命运。

但这只是一个被美化的想象性场景而已。经过历次大规模焚书，优秀的先秦神话早已灰飞烟灭，只有这部被视为经典的奇书，被西汉儒生“意外地”发现，在增删和篡改之后，超越自身命运而重返人间，成为唯一能跟儒家典籍并置的“异端邪说”，甚至以某种不和谐的面貌，介入各学派改造历史真相的文化运动。

《山海经》究竟向世人说出了什么？它究竟是中国巫师的杰作，还是西亚商人带来的世界地理手册？它何以能描述赤道太阳垂直照射的效应，并记录北极圈内长昼永夜的非凡景观？为什么它既有对印度尼西亚袋鼠“夔”和笑鸟的表述，也有对南美洲玉米的暧昧记录？

究竟是谁走遍整个世界，将这些广泛的地理知识，传播给一个正在东亚崛起的族群？时间的尘土覆盖了人类的记忆，以致人们根本无法重返那个天真明澈

的时代。

中国上古神话有着一些截然不同的父本，据此呈现出驳杂、破碎、重叠、自相矛盾、风格多样的面貌，本土和异族的意识形态，并置于太平洋西岸的广阔空间，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梳理。《山海经》似乎是唯一的例外。它采用中国折扇式的空间叙事，将碎片重新拼绘，然后不断折叠与打开，形成一些奇怪的语词褶皱——“西四十五里，曰松果之山；又西六十里，曰太华之山，又西八十里，曰小华之山……”这些副词“又”是褶皱的标记，它掩藏起“西四十五里”或“西六十里”的内部缝隙，将空间改造成一组彼此叠加的褶皱，犹如一把被仔细收起的折扇。

然而，《山海经》的折扇叙事，只是一种蓄意制造的错觉而已，它制造了褶皱的假象，仿佛地理空间的跨度被压缩了，而最终可以在填字游戏中重展恢宏的世界地图，但实际上它却是永久的褶皱，根本无法被展开。它不是完整的扇面，而只是一堆经过悉心黏合的地理碎片。

毫无疑问，《山海经》收藏了西亚、南亚和东亚的各种神话叙事碎片。它是一个笨拙的语词游戏或纪念体系，表达了“亚洲精神共同体”的古老信念。在汉代民族主体意识确立之前，中国始终是该共同体的一部分，并注定要以某种公共的语法，去记录东亚精神的发育进程。目前可以确认的先秦典籍，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，而《山海经》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，它以地貌、物产和神话意象的混乱符号，证明了泛亚共同体的坚硬存在。而在此背后，似乎还有更大的全球共同体的模糊身影。

然而，褶皱化的拼图，同时也是东亚失去神话的痛苦征兆。碎片为后人制造了一种“谜语效应”。在战国和两汉的原野上，到处飞扬着从神话树上飘落的枯叶，仿佛是一堆来历不明的生物遗骸。

此情形跟其他文明的神话是大相径庭的。无论苏美尔—阿卡德神话、埃及神话、印伊神话、希腊/罗马神话，都有显著的体系

性，具备完善的神谱，所有神祇的神格与造型清晰可辨，事迹(故事)保持完整的戏剧性结构，并跟历史叙事迥然有异。更重要的是，几乎所有神话都有初始原典(泥板、印章和雕塑)作为实体证据，而不只是后世的文献追述。它们把中国神话逐出了亚洲乃至世纪神话的顶层花园。

但就文明发展的逻辑而言，中国本土必定有过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神话体系。商代以后，书写技术发生重大突破，以漆写简的方式被广泛应用，每支简能记录10~20字，以绳索把诸简串联起来形成“册”和“篇”之后，就能书写长篇文字。此外，鉴于长江流域丝绸业的迅猛发展，绢帛为文字书写提供了更优良的介质。正是基于新技术的发明，东亚神话已拥有超越泥版和石头的物理载体，而能跟羊皮纸和莎草纸展开对等竞争。无论如何，它都应当表达“亚洲精神共同体”的普遍特征——囊括世界起源、诸神战争、诸神爱情、神圣婚姻，以及诸神之死等诸多元素，保持相对完整的叙事结构，甚至以史诗的庄重样式出现，并跟古器物纹饰发生严密对应。

令人诧异的是，就连汉民族四周的那些边缘民族，都拥有自己的创世和英雄史诗，其中最著名的是蒙古族的《江格尔》、藏族的《格萨尔王》、柯尔克孜族的《玛纳斯》，以及赫哲族的“伊玛堪”、鄂伦春族的“摩苏昆”、纳西族的“黑白之战”，由此形成坚固的史诗地理圈，犹如一个神话叙事的巨大花环，围绕着一个庞大而空无的中心。而就在那个中心，汉人茫然四顾。

谁制造了这场汉神话的浩劫？这无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。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务，就是打开《山海经》这个满载不明事物的箱笼，越过稀疏的语义，去寻找神话与神启的线索。■

红豆

文/熊召政

三游海南岛的天涯海角，都碰上卖红豆的小贩，红豆装在用过的装彩色胶卷的小塑料筒里，两块钱一筒。因为价廉，加之红豆的特殊意义，游客莫不争相购买。

我也买过好几筒送人，留下一筒放在书房里，闲暇时常常观赏。

唐朝诗人王维，以红豆为题，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：

红豆生南国，
春来发几枝。
愿君多采撷，
此物最相思。

诗人把红豆称为相思的信物，是有其根据的。晋人干宝的《搜神记》记载：

大夫韩冯妻美，康王夺之。冯自杀，妻投台下死。王怒，令冢相望。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间，根交于下，枝错其上。宋王哀之，因号其木曰相思树。

这相思木，就是红豆树。在广东又叫鸡翅木。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记载：

红豆本名相思子，其叶如槐，荚如豆，子夏熟，珊瑚色，大若茨实，微扁。其可以饲鸚鵡者，乃蔬属藤蔓子，细如绿豆，而朱棠黑啄，结实甚繁，乃篱落间物，无足贵也。其木本者，树大数围，结子肥硕可玩。

如此说，红豆就有了草本、木本两种。木本的红豆树，即鸡翅木，是海南的盛产。木本的红豆大，草本的红豆小。而天涯海角的小贩所兜售的，却是那种绿豆一般大的“朱棠黑啄”的草本红豆。

后来，又在《九通志》上读到如下的一则：

海红豆树高二三丈，宋祁益部方物略云：结荚枝间，其子累累珠缀。若大红豆而扁，皮红肉白以得名，蜀人用为果干。

这种红豆，又是可以吃的。但显然不是海南的鸡翅木了。因为吃这种果子的是四川人。

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也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相思子圆而红。故老言：昔有人没于边，其妻思之，哭于树下而卒，因以名之。此与韩冯冢上相思树不同，彼乃连梓木也。或云即海红豆之类，未审确否。”

看来，木本的红豆也有两种。这两种都有一个相思的故事。遗憾的是，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它们。放在书房里的这一筒，因是草本的，与相思的故事无缘，我也就不由得恼起那小贩来，何以能利用人们圣洁的相思之心，来兜售他的“伪劣商品”呢？

转面一想，我这是自生闲气。你说他的红豆是伪劣商品，他也会反问：“你能担保，买我红豆的相思客中，就没有冒牌货？”■